

浪漫愛、自我昇華與社會叛亂：歌德筆下的維特對中國一九二〇及三〇年代 書信體小說之影響

吳國坤; 張亦晴

Published in:
方圓

Published: 18/10/2022

Document Version:
Publisher's PDF, also known as Version of record

[Link to publication](#)

Citation for published version (APA):
吳國坤, & 張亦晴, (TRANS.) (2022). 浪漫愛、自我昇華與社會叛亂：歌德筆下的維特對中國一九二〇及三〇年代
書信體小說之影響. *方圓*, 14, 190-209.

General rights

Copyrigh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for the publications made accessible in HKBU Scholars are retained by the authors and/or other copyright owners. In addition to the restrictions prescribed by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of Hong Kong, all users and readers must also observe the following terms of use:

- Users may download and print one copy of any publication from HKBU Scholars for the purpose of private study or research
- Users cannot further distribute the material or use it for any profit-making activity or commercial gain
- To share publications in HKBU Scholars with others, users are welcome to freely distribute the permanent publication URLs

浪漫愛、自我昇華與社會叛亂： 歌德筆下的維特對中國一九二〇及三〇 年代書信體小說之影響

吳國坤著

張亦晴校譯

引子：《少年維特的煩惱》與五四時期的書信體小說

與西方文學傳統不同，書信體小說作為文學體裁從沒在現代中國文學中成為主流敘事手法，學者普遍同意上世紀二〇至三〇年代書信體之所以得到中國作家廣泛採用，與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著作《少年維特的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下稱《維特》) 的中譯本甫出版便大獲好評有直接關係。²

1 本文原文發表於：Kenny Kwok-kwan Ng, "Romantic Love, Self-Exaltation, and Social Rebellion: The Influence of Goethe's *Werther* on Chinese Epistolary Novel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in *Cross-Cultural Encounters in Modern and Premodern China: Global Networks, Mediation, and Intertextuality*, eds. Kelly Kar-yue Chan and Garfield Chi-sum Lau (Singapore: Springer Singapore Pte. Limited, 2022), pp.83-95.

2 歌德對中國書信體小說的影響最早由葉少嫻教授深入研究，參 Terry Siu-Han Yip, *Goethe in China: A Study of Reception and Influenc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1985); "The Reception of *Werther* and the Rise of the Epistolary Novel in China", *Tamkang Review* 22.1-4 (1991-92), pp.287-304。而其文學影響則較早前由李歐梵教授等學者提出，參 Leo Ou-fan Lee,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Chinese*

自二〇年代早期被引入中國，這個凄美的愛情故事迅速擄獲不少知識份子和年輕讀者的心，成為最常被再版的西方經典之一。這股熱潮反映出在夾雜著知識懷疑論的動盪時代，年輕作家和讀者的內心對未來的展望與沮喪——人們正苦苦追尋有效的表達方式來宣洩對國家未知未來的惶惑。《維特》不止以無果的單戀主題及感傷情懷吸引著讀者，當中所顯露出的、書信體小說的告解性質，亦激發作家以此作為表達內心深處感受和想法的有力工具。

本文先透過可靠細節來呈現歌德小說對中國深遠影響的全貌，其後分析中國文人對個體自由、浪漫愛與自我表達的重視，亦即《維特》受到中國讀者如此愛戴、並被視為小說創作靈感背後的社會文化景像。為了具體呈現書信體小說的基本構成完素，筆者將透過兩篇中國書信體文章，闡述這部德國浪漫主義代表作對現代中國文學的美學影響。

《維特》於1922年由郭沫若首次翻譯為中文，其譯本被大量翻印，不同詮釋亦相繼衍生，³在在引證了小說的受歡迎程度。緊隨其後，現代中國文壇迎來了前所未見的現象——書信體小說的百家齊放。同年，廬隱的〈或人的悲哀〉出版，這部短篇小說的取名顯示其與歌德文本間的獨特聯繫，其後更被譯為德文，並刊印於第一期的 *Deutsche Monatsschrift*，展現出當中歌德小說對中國作品的影

Writ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3 單是郭沫若的譯本也衍生出超過30個版本，及至20世紀中期，這部德國小說最少有60多個由不同譯者貢獻的版次與複印本流通市面。而包括郭氏翻譯在內，現時共有15個中譯版本。

響亦被德國雜誌所認證。熱潮持續，無數以書信體形式創作的文章登於文學期刊及報紙，但如此大量的書信體創作並沒得到有系統的記載，致使只有少數的相關文庫流存至今。

造就維特不可抗拒的魅力是他與中國文學傳統中才子形象的高度吻合——作為天性誠懇熱情，而又才華洋溢、富學養的年輕迷人男子，卻受命運捉弄而注定要經歷無盡苦難，甚至陷入單戀的悲劇。‘某程度上，「才子」與歐洲浪漫主義所定義的維特式英雄有著共通之處：被動順從的性格、與生俱來的多愁善感，使他不自覺沉浸於內在甚或無意識的世界。

此外，《維特》歷久不衰的魅力亦能歸因於其時社會文化大環境對自我表達、個體解放的提倡，例如不少作家從西方文學傳統中找尋靈感，使該年代處處體現著「浪漫」情懷，正如李歐梵教授所言，⁴該時期的浪漫傾向主要透過兩種神話精神傳遞：普羅米修斯主義 (Prometheanism) 及酒神精神 (Dionysianism)，前者歌頌人類對抗傳統教派的勇氣和過程中自我潛能的實現，後者則以強大的、愛的推動力打破邏輯與社會規範的桎梏，進而讚揚個體自由、感官知覺的敏銳及具創造力的意志。

五四時期的文人傾向把《維特》視為描述年輕人對個體化、感性、最純粹藝術表達狂熱追求的作品。⁶在《維特》譯本的序言中，

郭沫若特別指出這部歌德小說中值得讀者讚譽之處：情感主義、泛神論精神、對自然的崇拜、對原始生活的嚮往和對新生兒的尊重。⁷郭更進一步主張維特是德國十八世紀狂飆突進運動 (Sturm und Drang) 精神的化身，儘管中國知識份子視這部小說為藝術靈感和解放人類的最理想驅動力，他們還是忽略了在西方文化脈絡中，這齣愛情悲劇內在更深遠廣泛的哲學，乃至意識形態考量。例如這位年輕英雄可理解為德語語境中「厭世之痛」(Weltschmerz) 的受害者，所謂厭世之痛是一種源於人類理想與殘酷現實間的落差所造就的被動悲觀心態，⁸兩者間無法消弭的衝突最終迫使英雄走向自我滅亡。對捷爾吉·盧卡奇 (Lukács György) 等馬克思評論家而言，⁹《維特》提供了一種文學表達資產階級主體性的勝利，但這種主觀主義傾向的再現本身即是諷刺的——如要實現主體的自由，他必先遭遇資本主義社會自身無法根除的內部矛盾。

針對書信體敘事對表達主體感受和思想的潛能，五四知識份子似乎對歌德小說有另一番看法。身為詩人，郭沫若讚揚《維特》是一首純粹的、只有極少敘述意圖的詩作，但他忽略了書信體本身即為一種新的敘事模式，及其蘊藏的可操縱現實和人類情感的巨大可能性。例如他輕易假設歌德及其作的完整性，把虛構角色當成真有其人，書信體小說最吸引郭的正是那充滿直覺性的即興表達，恰好

4 Leo Ou-fan Lee,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p.284.

5 Ibid., pp.78-79.

6 參考柳無忌的例子：《少年歌德及其作品》（高雄：百成書店，1965）。

7 David Tod Roy, *Kuo Mo-jo: The Early Yea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134-138.

8 Leo Ou-fan Lee,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p.284.

9 György Lukács, *Goethe and His Age*, trans. Robert Anchor (London: Merlin Press), pp.35-49.

與文學作品中常見的人為操控相反。¹⁰不過西方評論家指出《維特》不能被視為單純的書信紀錄，亦非如五四文人所想，小說是對人類激情的赤裸表白之讚譽。相反，那是歌德精煉的文字，字裡行間充斥著具批判意味的自我覺察：有時陷入沮喪的主角會以斷句、不完整句子及未完成的字詞，來透露他對語言能否有效表達自我的質疑，¹¹歌德亦因此得以和筆下角色保持距離，並提醒讀者維特的世界觀與客觀現實間存在著危險的落差。

要理解一種文體，以下四個主要面向可作為切入點：一) 表達性，針對如何敘述作者或主角的精神情感狀態；二) 實用性，即如何影響讀者及與之溝通；三) 結構性，指表達媒介；四) 模仿性，著重寫作主題及被形塑的世界所傳遞的「訊息」。¹²關於文體的表達功能，眾多上世紀二〇年代作家假設書信體在本質上能真誠地或說純粹地表達，因此採用此種新書寫形式。他們信仰著文本透明度 (textual transparency) 及其能有效促進個體自由——每一個人有權表達自身情感以對抗現存的社會秩序與價值，尤其對急於為建立新的五四文化出一分力，而又缺乏經驗的作家而言，書信體看似是可靠又靈活的工具。在「實用」層面上，表述類文本 (expressive text) 被視為一種透明媒介，這種表達模式的結構模糊了私領域 (作

為私人通信) 與公領域 (作為文學出版物) 間的界線，讓作者或故事人物能向讀者傾訴秘密、私心和痛苦，這股對告解的狂熱常使書信體敘事帶有自傳色彩。而當作者以自身經歷的細節渲染創作時，他們實際以「模仿」遮掩了現實與幻想的差別。書信體本身即是一種自我矛盾的操作，有著坦承與逃避自身的雙重功能，讓其敘事之於讀者同時相悖地可靠與不可信賴。

更重要的是，書信體之所以會被廣泛認同是表達個人想法的透明媒介，與新文學運動強調的「原創性 (originality)」、「真誠 (sincerity)」和「個體性 (individuality)」有密切關聯。捷克漢學家普實克 (Jaroslav Průšek) 曾說：「現代中國文學其中一個標誌性特色是大量的主體元素，這與作者個體性成功從傳統桎梏中得到解放並愈加顯著有深刻關聯。」¹³作者開始以生動、像真的口吻書寫自身最熟悉的事物——最好是他／她的親身經歷，這種執著於「如實地」描述自身經歷的奮勇熱情因而建構了那個時代的「浪漫」情懷，進一步形成了強調「個人主義」與「主觀主義」的文學寫作風潮：前者指向對自身的著迷，後者則帶出個人觀點的演化，尤其對於現實的解讀通常與傳統看法相違背。¹⁴這種嶄新的寫實書寫實驗亦導致

10 Bonnie S. McDougall,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to Modern China: 1919-1925* (Tokyo: Center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1971), pp.134-136.

11 Maurice R. Funke, *From Saint to Psychotic: The Crisis of Human Identity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New York: Peter Lang, 1983), pp.54-55.

12 Janet Gurkin Altman, *Epistolarity: Approach to a For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90.

13 Jaroslav Průšek, "A Confrontation of Traditional Oriental Literature with Modern European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Revolu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4), in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d. Leo Ou-fan Le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74-85.

14 Leo Ou-fan Lee, "Romantic Individual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ome General Explorations", in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Studies in Confucian and Taoist Values*, ed. Donald J. Munro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5), pp.239-256; Jaroslav

大量帶有（類似於）自傳色彩的創作，讓作者能毫不掩飾地釋放自己的情感。

在現代中國的文化脈絡中，極欲如實表達個人思想情感的強烈渴望指出了個人與集體間的衝突，而書信體成為了調和的手段。在受《維特》啟發的小說中，其中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是愛情至上的思維，及伴隨的、掙脫包辦婚姻壓迫的行動。知識份子在一九二〇年代仍在大力提倡性別平等與基於愛戀結合的婚姻觀，因此可合理概括維特的愛情悲劇之所以得到大眾歡迎，並引發後續關注個體戀愛自由的書信體小說熱潮，是當時整體社會大環境的表徵。¹⁵如李教授所言，戀愛已成為新興道德觀念壓倒性的象徵，斷定了個體邁向解放及自我實現的決定性一步。去愛——即傾注自身之情感與精力換取所愛青睞的行為——被視為反抗與譴責偽善社會一切人為約束、並從而尋找真實自我和勇於在愛人面前坦露自身的英勇行為。

在勾勒了五四文人如何透過書信體與愛情主題的創作，來反映其對《維特》的投射與認同，並把這種現象置於一九二〇年代的社會文化脈絡以觀其時代意義後，筆者將轉向兩部有著極高藝術成就的作品——〈喀爾美蘿姑娘〉和〈或人的悲哀〉，詳細闡釋作者如何有意識地借用西方文學的創作思維和技巧，來表達他們在亂世間的

嚮往與沮喪。

癡迷與懺悔

郭沫若於1926年出版了書信體小說〈喀爾美蘿姑娘〉，作品以第一人稱寫成，並隱藏了自白者與其聽眾的身份名字，這種有別以往的做法沒有改變整體敘述語調，目的依然是向無名的受眾告白自身的秘密情感與身為丈夫的不忠。

整部小說即是一封悔過書，揭露了主角在東京留學期間對一名巧遇的姑娘發展出了非一般的癡迷，身為有婦之夫並需在完成學業之時回中國的他，意識到這份秘密情感終會受到社會的反對與禁止，這反倒令其熾熱的愛更顯偏執，尤其是無論如何他都無法擺脫那位姑娘難以抗拒的吸引力。在備受精神痛苦和罪疚感折磨的情況下，他在工作和家庭中均陷入危機。對所愛毫無保留節制的愛慾，使他在最終失去所愛時步入衰敗與自我毀滅。

被妻子視作模範學生、盡責的丈夫和慈父的主角，在街上遇見兜售「喀爾美蘿」（Karuméra，即糖餅，一種用糖熬製的甜食）的姑娘時，他的人生轉瞬向悲劇發展：這突如其來的一見鍾情打斷了他的平凡生活與原本應有的光明未來。當維特因為綠蒂純粹的美、明亮的眼眸、活潑好動的性格與對自然的熱愛而墮入愛河，郭沫若筆下的人物則痴迷於那無名無姓姑娘紅潤的雙唇、炯炯有神的雙目與天真無邪的外在，一切皆難以言說。這份愛愈演愈烈時，他拋下學習去看她，天天徘徊在她兜賣糖餅的街角，甚至偷偷尾隨對方回家，

Průšek, "Subj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57), in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d. Leo Ou-fan Lee, p.1.

15 另一部引起中國熱烈迴響的西方作品是挪威劇作家亨利·易卜生 (Henrik Ibsen) 所著的《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主角娜拉作為已婚婦女，決意離開以掙脫家庭與婚姻關係的枷鎖，其命運受到讀者和五四知識份子的激烈討論。

並在之後的每天刻意路過她家的窗戶，享受著偷窺的快感。驟看之下他的愛似乎在本質上是柏拉圖式的，只是渴求著與所愛的靈魂結合，但男性主體對純粹而熱情的「他者」的渴求，暴露了背後物化女體的痕跡。

我很想像一隻高翔的飛鷹看見一匹雛鳩一樣，伸出手去把她緊緊抱著。我要在她的眼上，在她的臉上，在她的一切一切的膚體上，接遍整千整萬的狂吻！我的心頭吃緊得沒法，我的血在胸坎中沸騰，我感覺著一種不可名狀的異樣的焦躁。¹⁶

假如我是醫生，我可以替她看病；我可以問她的姓名，問她的家族，問她的病歷，更用手指去摸她的眼睛，摸她的兩頰，摸她的頸子，摸她的手，摸她的乳房，摸她的腹部，摸她的……啊，不想說，不想說，我全身的骨節都酥了！我這 Mephistopheles！¹⁷

理想化女性的美與貞潔無阻男性想觸躐、剖析女體的性衝動，此時的他著迷於這種錯亂，在其中產生出與喀爾美蘿姑娘發生真實性行為的想法。角色這種行為以戲劇形式引證了上世紀二〇年代圍繞愛的本質爭論：愛的形式應著重精神抑或肉體層面。¹⁸被身體與靈魂的慾望拉扯，主角極力壓抑他的性幻想，視喀爾美蘿姑娘為神

性不可褻玩的存在。除了無時無刻受到兩種互不相讓的慾望——一方面是追求純潔的愛，另一方面是對不潔性慾的渴求——所困擾，主角亦必需經歷實現理想愛情和肩負起人夫、人父的家庭責任之兩難處境。這重複出現的課題標誌著混亂變革時期，個人與社會間的矛盾：對所愛的追求反映了主角的個人意向，而那正與捍衛婚姻和家庭的、更崇高的道德標準相違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筆下女性形象的雙重性。喀爾美蘿姑娘和主角妻子這兩種對女性不同的想像，與男性主體性及其慾望產生了引人入勝的關係。故事中男性敘述者從不給予喀爾美蘿姑娘表達自我的機會，令讀者無從得知她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有何感想，事實上她是個沒有實質的神秘存在，是為了滿足男性對純愛的投射而被創造出來。

與喀爾美蘿姑娘令人著迷的魅力相反，主角妻子則被描繪為母性的化身，有著一切傳統社會稱頌的美德。在丈夫眼中，她與生俱來有著女性的柔情與服從性，並遵從父權社會對大方得體女子的標準。面對丈夫的悲傷與及情緒風暴，她沒有一絲怨言地耐心回應，甚至一度表示若離婚能讓主角從失落中振作，她會欣然接受丈夫的請求。即使聖潔如她，男人從不滿足於這段建基於外在社會規條、而非人類心靈交流結晶的同盟關係。但正正是她的善念和無可挑剔的品行更凸顯了主角的罪疚，並作為道德反襯，約束著男人追逐禁忌之愛的想望。

對喀爾美蘿姑娘無法自拔的愛，加上被無從解決道德困境的絕

16 郭沫若：〈喀爾美蘿姑娘〉，《沫若文集（五）》（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頁 87。

17 同上注，頁 104-105。Mephistopheles 是歌德《浮士德》中的惡魔。

18 Leo Ou-fan Lee,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pp.266-271.

望所包圍，敘述者最終步向精神崩潰邊緣，備受失眠、健忘症和各種身體毛病折磨。不只如此，他還喪失了學習所需的分析力：當畢業試臨近時，他愈發變得無所適從與焦躁不安。主角意識到作為留學生，他背負著家庭與祖國的集體期望，種種疊加的壓力使他終日病懨懨，並開始在家人身上施加語言暴力（無故對妻子咆哮和責罵孩子）來發洩自身的絕望及沮喪。回國後他的狀態快速改善，但只消一封來自日本鄰居、提及到喀爾美蘿姑娘的信，便使他重燃那無法自控的激情，並決意回到日本追尋喀爾美蘿姑娘，而這亦導致了其衰頹的結局和自殺企圖。

我自己內心中藏著的一座火山把我全部的存在都震蕩了。
我的身體只是一架死屍，火車是我的棺材，要把我送到東京的廢墟中去埋葬。

我隨身帶得有一瓶息安酸，和一管手槍，我到東京去要殺人——至少要殺我自己！¹⁹

為了擺脫自身的罪惡感和可悲的存在，主角踏上了自我毀滅的道路，雖然讀者無從得知他有否付諸實行，但有關其強烈自毀傾向的暗示，足以指出主角自我的消亡。

主體主義在此處是理解書信體小說諷刺調性的關鍵。讀者可以輕易地留意到那無所不在、勇於表達的「我」（主體）的存在，這個主體旨在塑造高度主觀的現實，並進一步將東京呈現為經折射的世界和幽暗宇宙，主角必須在其中經歷令人厭惡的身份蛻變過程，以

及伴隨而來的個人失敗和道德敗壞。在這片由感知者無意識投射所創造的異域中，主人公若要坦誠面對真實的自己，就不得不化身為虛偽的存在：他必須盡可能「真誠地」貶低和責備自己，承認自己不配被視為在公在私皆有承擔的成員，強烈的自我厭惡與否定迫使他要以死亡來保持自我的完整性。這個反英雄 (anti-hero) 在重新定義自身為自由的主體之時，恰恰參與了自身的毀滅：

凝視著我自己虛偽的行徑，連我自己也有哀憐我自己的時候！我自己就好像一枝顏蠟，自己燃出的火光把自己的身體燒壞，在不久之間，我這點微微的火光也快要熄滅了。²⁰

敘事者筆下赤裸的告白精心建構了難以捉摸的女性形象，喀爾美蘿姑娘神秘面紗的背後正正標誌著主體性所富有的高度想像力。從精神分析角度出發，她的存在明顯是男性的投射，目的是鞏固敘述者完整的主體性。因此之故，可以說男主角對其所愛的追求是一種自戀行徑，恰恰映照著他所欠缺的：特定歷史時空下、不受社會束縛的個體自由與人生目標。故事尾聲處，主角因為要與假想出來的完美姑娘別離而陷入沉痛的哀傷，並意識到外在現實和自身盼望——打破現有社會體制（此處體現為婚姻）——之間存在著無法消弭的落差，進一步被巨大的悲傷淹沒。一旦受到無意識驅動，產生逃離社會規範的慾望，主角便偶然會聽見自身的超我 (superego) 苛刻地指責自我 (ego-identity)，並以死亡此一嚴厲的懲罰威脅著他。

主角與謎一般的喀爾美蘿姑娘在東京的奇異邂逅是「非同尋

19 郭沫若：〈喀爾美蘿姑娘〉，《沫若文集（五）》，頁 116。

20 同上注，頁 82。

常」的，因其違背了極欲逾越現有文化界限的衝動，而事實上他的不忠與多愁善感亦足夠令人憂慮，因其能導向失序和違法行為。²¹就歷史而言，文本中突如其來的氾濫熱情和荒謬同時是一九二〇年代新文學運動的特徵，正如中國學者梁實秋曾評論道：

到了最近，因著外來的影響而發生所謂新文學運動，處處要求擴張，要求解放，要求自由。到這時候，情感就如同鐵籠裡猛虎一般，不但把禮教的桎梏重重的打破，把監視情感的理性也撲倒了。²²

女性聲音

在郭沫若的《維特》譯本面世數月後，廬隱〈或人的悲哀〉出版。小說由女主角亞俠寫給好友 KY 的信件組成，書信得到後者小心保存，並在亞俠自殺後結集成書。雖這些私人信件風格零散，但實際上是有時序地記錄下女性對於人類荒誕的情慾糾結、爾虞我詐、革命熱情與空洞幻想等種種外部世界無法理解之處的內心感受。如《維特》相近，敘述者對主角一生進行了回顧，試圖探問她的主觀世界，揭示個體情感、悲傷的起伏。身體柔弱並飽受疑病症煎熬的亞俠，有意在花樣年華之際告別塵世，故事最終即以其早逝作結。

得知最初因愛成婚的朋友離異的消息，亞俠對兩性間存有真愛的可能不再抱任何幻想。當發現自身對兩位愛慕者皆沒有生起愛戀之心，她堅信生命沒無意義，索性以享樂態度過活，但漸漸地亦對所在的社會感到厭惡，決定前往日本找尋留學的哥哥並逃離一切。可惜其烏托邦幻想亦告破滅，對她而言東京是另一處惱人的地方，當地的社會主義組織只是表面健全無瑕實則滿口謊言的存在。亞俠繼而尋求宗教的慰藉，但對信仰缺乏真心誠意，窒礙了其尋找最終解脫之道。在身心靈都感到極端沮喪和疲憊的狀態下，亞俠跳入湖，並在死亡前的最後一刻，於大自然中得到片刻平靜。

郭沫若的小說把女人和愛戀建構成男人全身心追求的絕對而又終極的幻想與目標，而廬隱零散的敘事則大膽地揭破「浪漫愛」神話背後的陷阱和幻象，其筆下的女主角無法找到一個讓她願意展現柔情關愛的理想男性對象，而她的兩位追求者卻因對女人的著迷而虛擲生命。在此處男人單戀未果的情節，被作者以其中一人曾是狂熱的社會主義者的設定而遭到嘲弄，他心中的革命熱情在其熾熱的情慾需求下顯得無足輕重，最後因深陷單戀之情而病死。作為女性作家，廬隱沒有在創作中充分發展這種維特式主題，她更傾向深入女性心理，探究一個在現代社會中渴望解放與保持自我完整的女性，如何逐漸步向精神崩潰。

〈或人的悲哀〉與《維特》在角色動機上有其相似之處，兩位主角同樣希望在混亂的社會環境中確立自己的身份和安全感，徒勞無功的自我定義過程成為最重要的主題，記錄了個體在某歷史時刻所經歷的身份危機。亞俠所代表的不是渴望愛情的女人，而是夢想家、

21 Rosemary Jackson, *Fantasy: The Literature of Subversion* (London: Methuen, 1981), p.2.

22 梁實秋：〈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實秋自選集》（台北：勝利出版社，1954），頁 8。轉引自 Leo Ou-fan Lee,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p.258, n. 2。

完美主義者，並與社會格格不入的邊緣人，漫無目的地遊盪以尋找存在意義，這個角色體現了「感傷——沉思」或說是「夢幻」類型的浪漫氣質。²³ 在自身幽冥的精神秘境徘徊的同時，女主角嘗試以抒情的語氣描述其不斷受到自我折磨的現代靈魂狀態：

我在世界上，
不過是浮在太空的行雲！
一陣風便把我吹散了，
還用得著思前想後嗎？

假若智慧之神不光顧我，
苦悶的眼淚
永遠不會從我的心裡流出來呵！²⁴

亞俠的悲傷實質上來自無法在急遽改變的社會中定位自我：作為異化的知識份子，極欲保持內心純淨的追求造成她極端的個性，使其無法忍受生活中任何偽裝或平庸。在國內她無法再忍受生活的苦悶，為了擺脫沉悶乏味生活的束縛，她轉向遙遠而又充滿異國情調的日本，幻想那裡有著與此處完全相反的一切。在旅程中她走訪了東洋婦女和平會，並期待著和平會的會員皆是一群純潔、誠懇而

又充滿熱情的女性，但事實再一次地令她沮喪——她們都是些濃妝艷抹、塗上香水的上流社會女性。亞俠甚至以諷刺語氣指責共產主義者為自以為是的理想主義者：

她們所說的和平，是片面的，就和那冒牌的共產主義者，
只許我共他人之產，不許人共我的產一樣。²⁵

沉溺於追求靈魂的純粹使亞俠更進一步把身邊的人拒於門外。在日本遇見的兩個男人同時對她神魂顛倒，得知他們單純為了「不相干的人」(superfluous) 而相互懷疑嫉妒，亞俠感到被人類的虛偽冒犯及傷害：

我這時才恍然明白了！人類的利己心，是非常可怕的！……我和他們兩個，只是淺薄的友誼，那裡想到他們的貪心，如此利害！竟要作成套子，把我束住呢？……對於他們的友誼，我不能不感謝他們！但是照現在看起來，他們對於我，不能說不是另有作用呵！……我現在是被鈎的魚，他們是要搶著鈎我的漁夫，KY，人與人的交際不過如此呵！²⁶

值得留意此處把女性引作「不相干的人」，毋庸置疑與屠格涅夫筆下的典型角色——一群面對急劇社會轉變的、被剝奪的俄國知識份子——相呼應，作者故意以普遍形容男性的形象來描述女主角的存在，此舉意義重大，暗示要推翻中國傳統社會中女性受壓迫的現

23 Janko Lavrin, *Studies in European Literature* (London: Constable & Co, 1929), p.25.

24 盧隱：〈或人的悲哀〉，肖鳳編：《盧隱》（香港：三聯出版社，1983），頁19-20。

25 同上注，頁16。

26 同上注，頁18。

狀，亦正正由於亞俠自覺其女性身份，使她能擁護更崇高的精神之愛。然而她摒棄男人展現的非理性慾望，認為那是友誼的敵人，並與互信的美德背道而馳。由此可見亞俠的義憤很大程度是「神話式」的，她追求的是不計較個人利益、沒有算計，甚至不牽涉性吸引力的精神上的友誼，主張愛的忠旨是兩性的團結合一，其最美滿的表現是把自身利益拒於門口，將雙方昇華至更崇高的存在。

同樣地她認為物質享受與人類理想間存有對立關係，後者必然在本質上是純粹靈性的。蔑視、無視社會規則和人性的結果是主角活在自己的世界，拒絕對外部現實作出任何妥協。既然不對個體與社會能脫胎換骨抱有任何期望，她只能成為不相干的女人，而為了忍受生命的苦難，她不得不轉而「浪漫」：訴諸極端的主觀主義，其中只有自己的道德判斷。與外在徹底斷裂並沉浸在內省的利己主義中，這位被動的浪漫主義者展開了另一場徒勞的追求以超越孤獨，透過感受與自然、童年間的靈性親緣來為自身尋得片刻的慰藉與寧靜：

雨住雲散，天空飛翔著鮮紅的彩霞，青山也都露出格外翠碧的色彩來。山澗裡的白雲，隨風嫵娜，真是和畫境般的湖山，我好像作了畫中的無愁童子。²⁷

保有童真並自我聖化的夢終究是縱即逝的幻夢，從中只能感受到短暫的自由，過後在亞俠周圍的是如置身地獄的虛無，她重新思考一切，直至在最後意識到主體自由只會帶來更深層的孤獨與更多

無法解決的矛盾，即使曾感受到與自然的靈性交融，她仍然無法超脫自身的孤寂感。生命沒有出路又對社會未來感到絕望，她被迫無聲無息——甚至沒有怨恨——地自我了結。在中國文學與哲學傳統中，大自然激發著無數藝術靈感與知性思考，並且帶來道德修養的參悟，但此處有關大自然的描述透露著主角的死亡結局，進一步展現了《維特》在這部短篇小說中的影響。

總結：書信體創作的消亡

廬隱故事中的女主角是被動而好沉思的浪漫主義者，最後選擇在死亡中尋找依歸，以抵抗自身的不幸和過時的社會規條。而透過郭沫若筆下主角執於建構烏托邦的徒勞嘗試，可將其視為「奇幻——虛構」(fantastic-imaginative)類型的浪漫主義者。他報復式的自殺是為了控訴社會的不公不義與醜陋，同時其永久的婚姻關係亦只能透過主角的死亡得以解除，並進一步令他可與夢中戀人結合。「浪漫愛」的母題貫穿這兩宗悲劇，兩個角色同樣追求著在婚姻體制內外，更富意義的兩性關係。就社會文化角度而言，「浪漫精神」(romantic spirit)潛藏著推翻繼承自傳統習俗的人為界線的能量。

而從歷史角度來看，中國的書信體小說並不單單是西方文學的仿製品，而是在價值混亂、社會解體的時代，產自個體與社會間無法舒緩的緊張關係。明顯地，書信體創作與其時的浪漫精神有著相似之處：德國及中國小說共同圍繞著絕望、人類的愛與無意識的反

27 同上注，頁 21。

社會衝動進行創作，畢竟「所謂浪漫主義，最首要是對那過渡時期的內在反動，倒錯從前的慣俗和價值，打亂所有階級，毀壞所有信仰、所有確當方向，並逐漸將重心轉移至純粹外在的，意即，物質的因素」。²⁸ 然而即使這班中國作家竭盡所能歌頌個性、敬仰愛及反抗傳統，也並未能在作品中呈現具前瞻性的未來圖像，使得在文化上留下極待填補的空白與社會危機，造就上世紀三〇年代的革命浪潮抓緊機會隨即補上。郭沫若其後成為馬克思主義作家和中國共產黨政治宣揚者，而在短暫的創作生涯一直專注於描寫人類主體感受和 interpersonal 關係的廬隱，則曾被左翼作家茅盾譴責其過分沉溺於自己的內心世界，無法描繪出更廣義的社會現實。²⁹ 回頭看現代中國文學史，當上世紀三〇年代社會寫實主義重新定義文學應為集體意志服務時，無怪乎書信體作為傳達個體慾望與私密情感的創作模式，會逐漸失去其主流地位。

（吳國坤，現任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副教授，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英文專著《消失的視域：李劫人，地緣記憶，在中國革命危機中書寫成都》〔*Lost Geopoetic Horizon of Li Jieren: The Crisis of Writing Chengdu in Revolutionary China*，Brill 出版社，2015〕。中文著作《昨天今天明天：內地與香港電影的政治、藝術與傳統》〔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21〕，討論香港電影與內地政治及港英電影審查和冷戰地緣政治關係。）

（張亦晴，香港中文大學跨文化研究碩士，業餘譯者。）

28 Janko Lavrin, *Studies in European Literature*, p.25.

29 茅盾：〈廬隱論〉（原發表於1934年），肖鳳編：《廬隱》，頁235-242。